

《庄子》“三言”考辨

熊良智

《庄子》一书有“三言”之说，研究庄子文章的人似乎都无例外地要谈到它们，无论探讨庄子的文章风格，或是论及创作方法，或者是讲求修辞效果，又或者是讨论体裁样式，这些都已作出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。但是，就“三言”本身的认识，虽然也取得了许多一致的意见，特别是对“寓言”“重言”的看法，不过，依旧还有不少见仁见智的地方，所依所据又多他书旁证，似乎从《庄子》一书自身的论述和文章来加以探究的较少。本文拟从这一点出发，发表个人的看法。

(一)

“三言”的说法见于《庄子》杂篇第二十七《寓言》，第三十三《天下》。历来对于《庄子》一书内、外、杂篇的所属各有说法。持谨慎的态度，以“三言”为庄子门人、后学对《庄子》文章认识的结果。按传统的观点，《天下》篇乃《庄子》全书之序例，自是庄子自己的意见。我们知道，先秦学术，讲究师承，口耳相传，述而不作，外、杂诸篇至少也是庄子门徒的撰集，较之他书，更应作为可靠的依据。因而我以为，“三言”之说是庄子本人及其门人对庄子文章体例的总结。

清人刘熙载说：“庄子看似胡说乱说，骨里却尽有分数，彼固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，学者何不从蹈大方处求之。”（《艺概·文概》）“名者，实之宾也。”（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，下引《庄子》只注篇名）“名止于实，义设于适，是之谓条达而福持”（《至乐》）。名实之别，《庄子》明有见解，成玄英疏：“实以生名，名从实起，实则是内是主，名便是外是宾。”“寓言”“重言”“卮言”既然各附其名，自然有实之别，又怎么会如有人所说“庄子自别其言有寓、重、卮三言，其实重言皆卮言也，亦即寓言也。”（转引自闻一多《庄子》注）庄子的文章，《史记》说“剝削儒墨”。《天下》篇中，我们见他剖析诸子，条分缕析，他要“析万物之理”“判天地之美”，因而有人称《天下》篇为中国第一篇学术史。一书中论道德，说有无，言是非，讲言意，都在表明庄子自己的一套观念宗旨，由此，我们看到庄子对学术名实的辨别是非常严格透彻的。有的人以为庄子一贯主张“大辩不言”，“得意而忘言”，所以“三言”自然也是无别。其实庄子以为“言者不知”，那是因为言者各执是非，“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”（《齐物论》）。人世间之是非彼此皆是师其“成心”，所贵不当而已，“世因贵言传书，世虽贵之哉，犹不足贵也，为其贵非其贵也”（《天道》）。这不过是庄子站在一种超越的立场上来评判人间的言论。正如郭沫若在《庄子的批判》中说的：“他的见解自认为是绝对的，其他世俗的见解如儒如墨都只是相对的是非”，“他是以他的绝对以谴相对”。如果庄子果真以为知者不言的话，庄子本人也大可不必论什么道德，言什么彼此了，大可施行他的

“无为”思想，退出文场另谋他图。他虽然自己说是“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”，不过是说明他的写作方法而已。庄子在这一点上是直言不讳的：“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，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”（《齐物论》）指，就是名称，马，就是符号，用一种概念去说明一种概念不是抽象的符号，而是一种事物的代表，不如用事实本身来与名称符号加以比较说明，证明名实之间的关系，天地万物都是名与实的统一体。不过，以“实”来证“名”比以“名”证“名”好得多，所以他要取用“寓言”“重言”“卮言”三种体例，不离开具体的人物故事，让事物本身说话，“以言解言，不如以无言解之也。浸使白其黑而黑其白，屈其伸而伸其屈，则名与象又改矣，则天地万物，岂有定哉”？（王夫之《庄子解·齐物论》）

（二）

翻开一部《庄子》，许多文章都有虫鸟对话，夔蛇相怜，罔两问景，或者“蹲乎会稽，投竿东海”的公子钓鱼，倏忽报恩以凿浑沌的故事，还有的是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对话，也还有许多庄子自己也忍不住站出来的一番辩驳，或者就是“吾生有涯，而知无涯”似的议论。所谓“忽而叙事，忽而引证，忽而譬喻，忽而议论”（林云铭《庄子因》），汪洋恣肆，仪态万方。比如一篇《逍遥游》，劈头化鱼为鹏，倍风图南，当你正随它在九万里高空翱翔，俯视大地“其远而无所至极”时，蜩与学鸠又笑着自适其乐。小大之辨正未尽兴，百岁千岁的春秋之议又引你一片感叹。一会儿汤来问棘，一会儿尧让许由，肩吾与连叔正惊怖接舆之言，庄子就同惠施站出来讨论“无用之用”。又如《秋水》，浩浩茫茫，河伯望洋兴叹，北海之神得以谈天论人，以反其真，夔蛇有情，知而爱慕，风虽无形，尚能言“众小不胜为大胜”之理。神物论道才歇，历史人物又现，孔子游匡，公孙龙子发问，最后又是庄子拒楚聘，讥惠施，说濠梁之鱼。《庄子》的文章大多数就是由这样一些内容组成的。这样来看，说《庄子》的文章有“三言”，那末，这中间哪是“寓言”“重言”“卮言”呢？

《天下》作为一书之序例，属于作者自序一类的东西，《寓言》亦有如是说法：“此内外杂篇之序例也”（王夫之《庄子解·寓言》）。两篇的论述是这样的。

寓言十九，借外论之。亲父不为其子谋，亲父誉之，不若非其父者也。（《寓言》）

以寓言为广。（《天下》）

重言十七，所以已言也，是为耆艾。年先矣，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，是非先也。（《寓言》）

以重言为真。（《天下》）

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因以曼衍，所以穷年。（《寓言》）

以卮言为曼衍。（《天下》）

“寓言”是“借外论之”。在《庄子》中什么是“外”？郭象注：“寄之他人”。即凡非庄子自己都是“他人”。“重言”中的尧、舜、孔、颜皆属他人。“重言”岂不就变成了“寓言”？庄子的“外”并非所谓他人，乃是相对于“我”之外者。《庄子》有《外物》篇，《释文》引王云：“外物，夫忘怀于我者，固无对于天下，然后外物无所用必焉”。庄子的“我”，并非个人的代名词，乃是“人类”的代名词。庄子讲究适物任性，各守其分，因为“吾生有涯”，所禀之分各有极也”（《养生主》郭象注）。懂得“天”与“人”的区别，各自的作用和地位是“知”的最高道理。“渺乎小哉，所以属于人也，警乎大哉，独成其天”。（《德充符》）“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重矣”。（《大宗师》）“天”“人”之辨是庄子整个思想的基本出发点，自然之道是其核心，一切要顺天之为，反对人之所为。因而这个“外”

就是相对于“人”的“天”，即人类以外的自然界、自然物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“寓言”是指采用神话方式，描写自然物的人格化的故事。象《逍遥游》中的鲲鹏，《齐物论》中的罔两，《人间世》的栎社见梦，《应帝王》中“浑沌”的故事，《天地》中的淳芒遇苑风于东海之滨，《在宥》中的云将东游等等。可见“寓言”中的对象是自然、神灵，手法是拟人化，鸟兽能言，无生命者会有人的行为。不过，有的“寓言”，其人物有国有名，既非神，也不是鸟兽虫鱼，象《外物》中的任公子，很象历史传说中实有之人，如不注意写法上的特点则以为重言。任公子钓鱼，“以五十犗为饵，蹲乎会稽，投竿东海”，这种神话式的描写，远非一般的夸张和象征可比。而名之“寓言”，乃是寄寓之意。即“寓言”一体，皆述故事，几乎不发议论，将其论隐寓在这类故事，所谓“托物寓意明道，如所云譬喻是也”。

（释憨山《庄子内篇注》）

而“重言”，前人已多指出是引证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。明人陆西星《读南华经杂说》指出：“重言所称引黄帝、尧舜、仲尼、颜子之类。”这就是所谓的“年先”，即先于庄子自己的历史时代。“重”，郭注为“世之所重”，即直隲切，今读为zhòng音。而“重”又可读为chong音，即直容切，其意思，《广韵》：“重，复也”，案《庄子·寓言》“重言十七，所以已言也”，正是指的黄帝、孔子的事是过去发生的，并已经为人记述，或为民间口头流传，而今为《庄子》重复引用。比如《人间世》：“孔子适楚，楚狂接舆游其门曰：‘凤兮凤兮，何如德之衰也，来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’”。与《论语·微子》相参，可信实有其事，已为过去所言，而今用之，自是重复。如读为“重（zhòng）言”，则不知《庄子》书中“轻言”为何？或有说是“借重”之意，而“借重”他人，不正是引证重复历史故事吗？

但是，我们看孔子、颜回一些人物确也是历史上实有其人，而黄帝、尧、舜就只能算是传说中人。因此，严格地说，“重言”应是记述历史和传说中人物的事。这也是“经纬本末”的意思，“本末”就是有历史传说的脉络可寻，所以为“真”，“经纬”则是王夫之认为的“有才德”。不过，读过儒家经籍的人都会发现《庄子》书中的孔子差不多面目全非，所言所行与可靠的文献相比大相径庭。这又正是“重言”的一大特点，人是真的，许多事、许多话是假的。这也是易与“寓言”相混的，如不注意对象和写法的区别的话。在写法上，它们多是朴素的对话体，间或也发些议论的。比如《人间世》写颜回将去卫国，请教孔子的治国之方，颜回的三种方法孔子都不同意，最后孔子告诉他应以“心斋”之法，“虚而待物”。拿孔子的话去同《论语》等书相参，找不到与孔子主张的治国之方有丝毫共同之处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卫君欲得孔子为政，子路问：“将奚先？”孔子主张“必也正名乎”！又《徐无鬼》记：“仲尼之楚，楚王觞之，孙叔敖执爵而立，市南宜僚受酒而祭”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说：“按《左传》孙叔敖是楚庄王相，孔子未生。哀公十六年，仲尼卒后，白公为乱，宜僚未尝仕楚”。由此，知其事、其言不可稽求。

关于“卮言”，应该说是看法很不一致的问题。在《庄子》的文章里面，除了上述两类内容，就是庄子自己的故事和庄子自己在文章中发的议论了。庄子自己不会为“外”，也不会为自己的“年先”，因此，我们说“卮言”就是庄子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议论。王夫之在《庄子解》中指出：“凡寓言重言与九七之外，微言间出，辩言曲折，皆卮言也”。这“微言”自是表现庄子思想的精微大义之语，那许多抽象玄妙的议论，多是表现文章主旨中心

的。《逍遥游》中“小知不及大知”，“重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。《大宗师》说天人，论“真知”，阐述“道”的特点，《齐物论》《德充符》也莫不如此。而“辩言”往往是庄子同惠施的辩论，所以“曲折”乃是伴随有叙事的委婉曲折之意。《德充符》惠子与庄子争辩：“人故无情乎？”《逍遥游》中二人争论有用无用，《齐物论》里庄子梦为蝴蝶，讲物化，表明庄子万物同一的观点，都是此类辩言的表现。

然而，这里我们要问，何以《庄子》要以自己的故事和言论为卮言呢？庄子以自然为宗，“畸于人而于天”（《大宗师》）“尽其所受乎天”（《应帝王》）一切以天道为本，这就是“和以天倪”。《齐物论》解释“何谓和之以天倪？曰：是不是，然不然。”郭象注：“天倪者，自然之分也”。“和以天倪”，就是合于自然。而自然之道，就是“万物之所系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！”（《大宗师》）化，就是造化，变化，万事万物都系于循环不已、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，因此，有与无，生与死，善与恶，物与我不过都是转瞬即逝，不可确定的，论什么彼此，说什么是与非呢？所以“是”就是“不是”，“然”也等于“不然”。这当然是庄子以自己绝对的“道”来看待人世间相对有限的“物”的结果。他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，不遣是非，以与世俗处”。因而《寓言》《天下》都指“与言”为“曼衍”，故成玄英疏为：“曼衍，犹变化也”，“和以自然之公，所以无是无非，任其无极之化”。当然，庄子并不真是无非无是的，只是他不以别人之是非为是非，“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，而非其如是”（《齐物论》）。他是把自己作为最高的“道”——绝对正确观念的代表。郭沫若曾以《逍遥游》为例说：“《逍遥游》篇虽称‘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’，然以为‘犹有所待’，不及‘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’的人，这种人自然就是庄子自命了。”（《庄子的批判》）《庄子》自称其言行为“子言”，就在于“卮言”体现了他自己绝对的“自然”之道。“卮”，《说文解字》“圆器也”。《汉书·高帝记》引应劭曰：“卮，乡饮酒，礼器也”。陆德明《释文》引《字略》云：“圆酒器”。这种圆酒器，何以被用到庄子体现“天道”的“重言”上呢？就因为道家以为天道为圆。而“圆”的特点，就是庄子的“道”的特点。“卮”字本有圆义，其音亦与团近。《吕氏春秋》有《圆道》篇，也讲得很明白：“天道圆”，“还周复归，至于主所。圆道也。令圆，则不可，善不善，无所壅塞矣。”高诱注“不可者，能令之可，不善者，能令之善，化使之然也”。这不正是庄子在《齐物论》里所讲的：“何谓和之天倪，是不是，然不然”的道理吗？而“和以天倪”乃“卮言”的一大特点。《庄子·寓言》篇的解释更把“卮言”体现圆道的特点加以了直接明白的表述：“始卒如环，莫得其伦，是谓天均，天均者，天倪也”。“均”即“钧”，制作陶器所用的转轮，而“始卒如环”，这不正是“圆”吗？

(三)

庄子及其门徒把《庄子》的文章用“三言”来概括，又宣称为“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”，这可以说是对“三言”特点的最精练的表述。“荒唐”就因为“寓言”是“从空葛撰出来的”（林云铭《庄子杂说》），它取材的皆是神灵虫鸟，非为人类，写法是自然物之人格化，其意寄于事中，不见多少正式的议论说理，作用在虽为“外”物，而其理则“广”，可以比拟人世。“谬悠之说”就是“重言”，取材于历史传说中的久远之事，写法多

是朴素不夸张的对话，间或有些议论，作用在要人信其“真”实。而“元端崖之辞”，是因为庄子的“道”，“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，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”（《大宗师》）。他的言是“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所由来”的“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”（《齐物论》）。无有其极，循环如圆，所以名之“卮言”。庄子直接辩驳、议论是写法特点；作用在于要体现“曼衍”——自然之道的运动变化，不管是与惠施对言之事，或是抽象说理皆很鲜明。所以“卮言”正是大发议论而直言，而“寓言”则不发议论而隐言，“重言”，则重述古人之言于事中。它们三者的关系在于：“卮言”是其核心，“重言”为它在历史中找依据，而“寓言”在说明它的道理广博，可以“广”及异类。

但是，《庄子》中的文章并不都是这样截然可分的，有许多文章就明显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。《秋水》河伯与北海若的故事本是寓言，可是其中议论纷纷，而且长篇大论，“牛马四足，是谓天，落马首，穿牛鼻是为人。故曰：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，无以得殉名。谨守而勿失，是谓反其真”。夔蛇风目之言亦是。而“卮言”本是庄子自己的言论和故事，并无神话式的写法，但《至乐》写道：庄子之楚，见空骷髅而问，骷髅梦，见骷髅深瞑蹙额曰：“吾安能弃南面王乐，而复为人间之劳乎”？完全是神话，与《齐物论》庄周梦蝶相比，迥然有异。

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，蝴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蝴蝶，则必有分矣，此之谓物化。

这完全是一种真实的叙述，所以有人说：“庄周之梦为蝴蝶，自是生活的真实，而蝴蝶之梦为庄周，实乃艺术的幻想”（张松如《说蝴蝶梦》）。此话前半是对的，后半值得商榷，因为文章说：“不知周之梦为蝴蝶，蝴蝶之梦为周与”！完全是一种冷静的发问，并非真的写庄子为蝴蝶栩栩，而是梦的结果。又《外物》庄周往贷粟于监河侯，庄子以涸泽之鱼讥监河侯，其鲋鱼自言东海波臣，犹有喜怒，忿然作色，这也是卮言故事中有寓言的写法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或通篇皆议论，象《法篋》《骈拇》《马蹄》，或通篇皆是故事，象《让王》《盗跖》《渔父》《说剑》。而外篇《至乐》“种有几”一段更为奇妙，这本是一段抽象的议论，可是却有了寓言的成分，神话式的叙述：

种有几，……乌足之根为竈蛸，其叶为蝴蝶，……久竹生青宁，青宁生程，程生马，马生人，人又入于机。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

这一段话，要说明生物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发生变化是有道理的，但说一种“乌足”草，它的叶子可以变为蝴蝶，恐怕这是一种想象之辞吧。而更绝的还在于后面。“久竹”，乃久不生笋的竹子，“青宁”是一种虫，而“程”呢？《列子释文》：“《尸子》云：程，中国谓之豹，越人谓之猯”。而罗勉道说“《笔谈》云：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，盖言虫也”。（《道藏》第十六册《南华真经循》）“程”无论为豹为虫，能生马，马又生人，岂不是神话。

不过，这种“三言”混杂，或是“三言”不备的现象，几乎全是见于“外篇”“杂篇”。它们不象“内篇”的文章组成结构一贯，每篇文章都由“寓言”“重言”“卮言”组成，其中仅《德充符》不见“寓言”，三言各自的特点也不相混淆，可以较为明确分辨哪是“寓言”

（下转115页）

提高了国民党党权。所有这些,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走向高涨,其功绩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毋庸讳言,这次会议也存在明显的不足,主要是:(一)会议对蒋介石的斗争不够彻底,只是试图加以限制而已;对于蒋介石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没有给予严厉制裁;特别是会议仍保留了他的北伐军总司令职务,使之大权在握,伺机反扑。会议闭幕不到一个月便发生“四、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。(二)会议对当时以“左派”面目出现的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认识不清,缺乏警惕,尤其是对汪精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,把“迎汪复职”当作党权运动的中心口号。其结果在汪精卫“七·一五”政变的打击下,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毫无思想准备,终于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陷于失败。

虽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有严重的历史局限,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会议能取得上述成就,是难能可贵的。同失误相比,其功绩是主要的,完全可与国民党“一大”相媲美。除本文上面谈到的以外,这次会议还涉及许多其他问题,限于篇幅,这里不再赘述。总而言之,在60多年后的今天,对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进步性,我们应实事求是地给予充分肯定。

注释:

①⑦②②⑤《对全体党员训令》。

②蒋介石《苏俄在中国》。

③转引自曾宪林《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迁都之争》,《江汉论坛》1983年7期。

④⑥⑩《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》上册,第299、298—299页、306—307页。

⑤汉口《民国日报》,1927年2月23日。

⑧《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案》。

⑨⑭《农民问题决议案》。

⑩⑪⑫⑬⑮⑯《对全国农民宣言》。

⑰⑱⑲⑳《对全国人民宣言》

(上接120页)

“重言”“卮言”。而“外”“杂”诸篇则不甚一致,不具备“三言”的有十九篇,三者具备的仅七篇,或者全是故事,或又通篇议论的有九篇。在写法上,“三言”混淆不一,特别表现在“寓言”与“卮言”的混杂。又“内篇”中,“卮言”故事里,全是庄子与惠施的对驳,而“外”“杂”二十六篇中,庄子与惠施的故事仅见于《秋水》《外物》《徐无鬼》《寓言》四篇,无怪乎有学者要说:“或因惠施而有内七篇之作”(王夫之《庄子解·天下》)。由此,我们也确可认为“内篇”和“外”“杂”篇非出自一人手笔。按此统计,“内篇”可指为寓言的有九则,重言二十八则,“外”篇寓言四则,重言五十四则,“杂”篇寓言六则,重言三十八则。因而“十九”“十七”的说法,未得明察,兹不赘言了。